总　序

张宪文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大变动、大发展的时代，它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和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中国人民的觉醒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可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至清朝末年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鸦片战争向中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国人民开始奋起直追。十九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中国。为此，中国人民不断努力，前仆后继，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付出了无数牺牲代价，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1911 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这时，皇帝被赶下台，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勾画了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雏形，展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图景。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民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毫无疑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但是，我们不能期望通过一次暴力革命解决中国改造和发展的所有问题。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仍然欺压中国，封建主义的遗留仍然大量存在，中国仍然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共两党都以自己的政治模式探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道路。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希望和良好机遇，但都因为执政者的失误和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丧失了。

1949 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二十世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转折。它完成了国共两党政权的转移，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并从此站起来了。这时，中国经济虽仍落后，但是经过建国初期的努力，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被荡涤，整个社会出现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廉政清新的景象。

1949 年后，由于我国领导者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未能自觉地实行新的社会转型。经济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上，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和高度集中，影响了人民民主的高度发扬；对外关系上，在苏美冷战对立的形势下，坚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直接影响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和对世界的全面了解，也影响着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进步。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中国又一次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世界各国突飞猛进的局面下，中国又落在人家后面。

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使中国人民清醒。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在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主动实行改革开放，自觉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78 年的转折，是我国在总结深刻的历史教训基础上的一次理性的、主导性的社会转型。它开始把一个不完全的、具有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引向更高的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

很显然，1912 年、1949 年、1978 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无可取代的三次重大的转折点，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然而，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大事件迭出不穷。1927、1935、1937、1945 等年代，也给中国的历史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记。学林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中国 20 世纪显要之年丛书》，对二十世纪这些关键年代逐一作出分析介绍，是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刻实践意义的。它帮助人们进一步掌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深刻理解历史的进程和曲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丛书作者是一批学有专长、有学术造诣的中年历史学者。他们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深刻观察，把二十世纪众多关键年代的重大事件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吸取经验，指导未来。作者们也试图在保持历史真实面貌基础上，把丛书写得更加活泼、生动，这对史学界来说，无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和历史学工作者对这一尝试提出改进意见。我们衷心祝愿丛书成功。

2004 年元月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序

历史总是匆匆而过，岁月留下抹不掉的记忆。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每一件事都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在漫漫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经历的磨难令人难以忘怀。

1937 年是中国很不平静的一年。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年中，将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全盘兜底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从七七卢沟桥河畔的夜幕枪声，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 20 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惨剧，世界为之震惊，人类为之耻辱，中国被逼到民族生存最危急的生死线上。数以万计的日本军队横行跋扈于中国领土，成群结队的日军飞机肆意盘旋在中国的上空，机枪大炮对着中国国民狂轰烂炸。

这一年中发生的事情具有戏剧性。国共两党从生死冤家变成患难朋友，曾经是两军对垒的战壕变成共同抗日的疆场，曾经欲杀之而后快的仇人竟然坐在一起共商国家、民族大事。从西安、庐山到南京，国共两党的巨头们频繁交往，虽不乏龃龉，但毕竟握手了结了十年的前怨旧仇。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前线，实现了国共两党军队配合作战的可喜局面。

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英勇壮烈。宛平激战、淞沪抗战、太原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留下了一曲曲中国将士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涌现了许许多多流芳百世的抗日爱国英雄。他们以罕见的坚强毅力，向侵略者展示着百折不挠的民族品质。

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波澜壮阔。神州大地被抗日的热浪裹滚，爱国主义精神荡漾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全民族凝聚成一股不可撼动的力量。祖国的东西南

北、城市乡镇、街头田野，人们奔走呼喊、捐钱献物、慰问支前。国难当头，空前的团结一致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不可侮！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37 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虽然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始终被笼罩于民族危机的阴霾之下，但像 1937 年这样遭遇全面侵略和直接的亡国危险还是第一次。如果说，一个泱泱大国的衰败之象早已在此前显露的话，那么，到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将一口吞掉中国的妄想付诸实施时，则将中华民族推上了亡国的边缘。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被沦陷逃亡的恐慌威胁着，中国人民从老人到孩子都被要当亡国奴的忧虑缠绕着。犹如在火山上煎熬，中华民族将怎样应对这生死存亡的难关？

对于共产党来说，1937 年是一个新的起点。此前，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国共内战，中共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和破坏。1934 至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写下了威壮无比的史诗，但这毕竟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折腾，中国革命跌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长途跋涉保留下来的当然都是千锤百炼的革命精英，但人数微少；陕北根据地的开辟当然使中共有了可靠的立足之地，但那是一片远离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偏僻荒土。如果历史没有提供一个扭转态势的契机，中共发展的空间依然是狭小的。1937 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共发展壮大的契机。中共从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走了出来，树起民族抗战的大旗，从而站到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上。

对于国民党来说，1937 年是一个大转变。从 1927 年 7 月到 1937 年初，国民党除了自身内部的混战外，主要的矛头对着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给中共结下一笔血债的同时也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空隙。深重的民族危机终止了国民党继续朝错误道路上陷滑下去的危险。不管国民党在 1937 年的转变是否出于真心诚意，也不管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有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它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则给中国的历史带来了转机。整个 1937 年，国民党和其领袖蒋介石的表现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对中国社会来说，1937 年是一次全局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结构模式和运行秩序。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受到战争的冲击而发生转移性的变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首都向武汉、重庆搬迁；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工业向内地转移；大批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撤离原集聚地重新进行组合。这种迫于战争而发生的社会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它既是中国社会承受沉重压力的表现，又促使着中国社会进行布局上的调整。一个个新的成长点由此逐渐冒芽落根，一些近代文明尚未光顾过的偏僻角落由此逐

渐解蔽开化。

1937 年是中国值得欣喜的一年。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蹂躏，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以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首开先例，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西方各国和日本凭借着这些条约所享有的各种特权，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军事威胁、人格歧视，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始终抬不起头来。百年的侵略，百年的反抗。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到义和团的反帝怒吼，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始终没有中断过。然而，这些斗争都没有取得过像样的胜利。近代以来中国几次大的反侵略战争中，虽然不乏官兵浴血奋战的事例，但懦弱无能的统治阶级，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却没有正正规规地组织军队与帝国主义交过手。严格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历史上，真正以战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完胜，1937 年掀起的抗日战争是第一次。这次战争是以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因此，尽管 1937 年战争的最初岁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凶狠的进攻态势一度给中国蒙上灰暗，但中国人民迎来的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历史起点，一个走向胜利的历史起点。

作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Ⅰ 止戈为武:国共双方频繁晤谈 1

西安事变后，围绕蒋介石生死处置问题展开复杂而微妙的斗争；蒋介石脱险飞离西安时说："今后我决不剿共"；"君子协定"引出国共秘密会谈，两党解冤结和，但一波三折；周恩来两上庐山会见蒋介石商谈合作事宜；七月战火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两党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芥蒂，但还是实现了第二次握手；南京国防会议上，国共代表统筹抗战大计。

Ⅱ 华北危机:卢沟桥烽火骤燃 22

日军蓄意挑衅扩大侵略，卢沟桥石狮见证是非曲直；二十九路军绝地反击，热血谱写爱国篇章；蒋介石电令宋哲元："守土应具备必死决战之决心"；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结果一次次努力都化为泡影；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中国回答"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Ⅲ 统筹战局:中国抗战力量调度和布局 39

国民政府制定一揽子国防计划，军事备战瑕瑜互见；南京国防会议上，周恩来透彻析形势，语惊四座；蒋介石划分战区，排兵布阵，志在一博；红军将士以民族利益为重，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北伐名将"临危受命，

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在南方开辟抗日战场；晋察冀成为第一个抗日敌后根据地。

Ⅳ 生死激战:抗战之初的三大会战 57

中日两军激战铺开战场；淞沪会战，使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成为梦呓；国共联手会战保卫太原，平型关首传捷报，忻口战役严惩敌军，傅作义临危受命守太原。唐生智主动请缨保卫南京，绝地奋战，指挥混乱，激战之后仓促撤退;三地保卫战英勇悲壮。

Ⅴ 国际反响:苏美英德百态千姿,世界人民声援抗战 80

中国战事牵动国际社会，各国态度不一；苏联予以道义和物质上的施援，助中国抗战一臂之力；英国不愿开罪日本，张伯伦对中国亮出底牌：“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意欲阻止日本侵略行为，但实施援华政策困难重重；德国出面斡旋中日冲突，陶德曼大使调解失败，德国转而向日本投送秋波；世界各国人民伸张正义，声援中国抗战；各地华侨心系祖国抗战大业,由衷表达拳拳爱国之心。

Ⅵ 做领袖梦:蒋介石其人其事其心态 100

蒋介石想当中国的希特勒，但难望其项背；奉曾国藩为偶像，“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殃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有所醒悟，从执意“剿共”到决心抗日，历史推动蒋介石发生转变；蒋介石一生纵横捭阖于军界官场，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但地位一直摇摇晃晃，*1937* 年的民族危机圆了蒋介石的领袖梦，对共产党的防范始终是蒋介石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

Ⅶ 砥柱中流:毛泽东与中共抗战方略 114

抗战前的毛泽东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传奇人物，《红星照耀中国》向世人介绍中共新领袖；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和中共高层领导密切关注形势，以清醒准确的判断和指示，引

领中国抗战的航船；小镇洛川云集众多中共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共商作战方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奠定民族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

Ⅷ 同仇敌忾：知识分子投身抗战，社会名流作出表率 128

书生七子走出象牙塔，投身抗战洪流，充当唤醒民众的先锋；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知识界发出抗战的怒吼；上海文化人激情似火，掀起救亡热潮，《救亡日报》号召“不惜牺牲，焦土抗战”；郭沫若别妻抛雏，回国效力抗日。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爱国领袖，“七君子”走出铁窗，誓为国家民族而奋斗。

Ⅸ 惊天泣地：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44

残暴的大屠杀陷南京为人间地狱，六朝古都血流成河，日军制造 *30* 万具白骨，写下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离奇惨虐的杀人手段、空前野蛮的奸淫兽行、贪婪无比的疯狂抢劫、无所顾忌的纵火破坏，日军的暴行使人类文明倒退了数千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造孽者们难逃历史的正义审判；拉贝虽然没能让“安全区”躲过劫难，但国际人道主义树起不倒的丰碑；东史郎等良知醒悟，忏悔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和篡改历史，务必正视和警惕。

Ⅹ 重心西移：为持久抗战作准备 171

“永绥号”驶离南京，开始炮火下的迁都之行，山城重庆成为国府抗战大本营；一场抢救教育事业和文物财产的战争紧张而艰难地进行着；高等院校纷纷内迁，众笈荷重，历经万苦千辛，“虽颠沛流离，而弦歌不绝”；工厂业主呈请迁移，国难临头之际，表露爱国之情；资源委员会调度工厂内迁，完成了“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为抗战保存了经济实力。

后 记 郭太风 188

止戈为武:国共双方频繁晤谈

1. 西安城内的“君子协定”

1937 年的扉页是由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揭开的。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西安临潼华清池的一栋寓所里响起了激战的枪声,枪战之后不时地传出窸窸窣窣的搜索声和吆喝声。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开始亮起来。几个身着东北军戎装的士兵,从寓所后面的山上押下一个冷得簌簌发抖的中年人。他散乱地套着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光着袜底,身上沾满了尘土,一副迷惑的眼神打量着押解他的士兵,急切地想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此人就是蒋介石。发生枪战的寓所称为“五间亭”,“五间亭”背后的山是骊山,山腰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后来筑起一座亭子,称为“兵谏亭”。华清池原来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风流爱情闻名千余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又增添了近代珍贵的名胜古迹。

蒋介石来西安是要亲自坐阵督战,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执行“剿匪”任务,向共产党驻扎的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这对身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张学良来说,本是职责范围里的事。但是,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背着“放弃东北”黑锅的张学良,五年来寝食不安,难以摆脱良心谴责。面对国土一片片沦丧、中华民族遭受一次次屈辱,满身军人血气的张学良不愿驱使官兵,避开气焰猖獗的日军铁蹄,却在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横亘躯体。张学良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抗日御侮的决心。

早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私下里寻找通往红色区域的渠道,悄悄地与共产党挂上了钩。经过多次密谈,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几个亲信来到延安,在一所教堂里与周恩来会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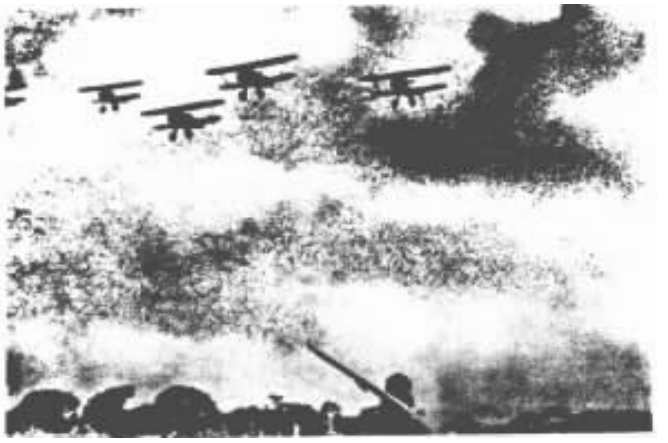
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些躲人眼皮的事情，蒋介石未必知晓，但是东北军“剿匪”态度不积极、战绩不辉煌的反馈信息令蒋介石非常不满。为此，蒋介石除了从南京一次次发出加紧“剿匪”的指令外，还不顾远途的疲劳，于 1936 年 10 月下旬飞抵西安和洛阳，身临前线督战。他大动肝火，一再向张学良、杨虎城等施加压力，并亲自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对红军作战。12 月 4 日，蒋介石从洛阳来到西安。在一次对军官们的训话中，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斥责道：“现正值国家存亡之际，敌人有远有近，事情有缓有急，最近之敌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急事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有些人敌我不分，远近不明，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不革命，就不是革命军人。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张学良、杨虎城自然明白这番火是冲着他们而发的，也明了蒋介石誓与共产党为敌的铁定决心。但他们仍努力劝说蒋介石抗日。12 月 9 日，张学良又一次到蒋下榻的寓所“哭谏”，言恳意切，动情之处，声泪俱下。可是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居然对张学良吼道：“要我不剿共，你现在就枪毙我！”蒋介石态度强硬，并调遣中央军威胁东北军、西北军，终于逼迫张、杨铤而走险，实行“兵谏”。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给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舞台添加了一道难题。尽管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并无杀蒋之意，但被囚禁的蒋介石命悬一线，这是因为东北军将士们对自己的故乡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沦丧早就憋着一股子气；西北军长期受蒋介石的歧视和冷落，官兵们的怨气也积之已久；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蒋介石交恶近十年，血债之仇可谓不共戴天。因此，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一经传出，沸腾的舆论炸开了锅。“公审判决”的呼声和“杀蒋”舆论随之而起。蒋对自己能否活着离开西安心里是没有底的。

12 月 12 日清晨，当他狼狈地被东北军士兵从藏身的骊山上押解下来时，终于明白了华清池的枪声不是发自于共产党，而是发自于他的副司令，气愤之余稍许镇定了些。蒋对押解他的东北军士兵说：或者把他送回洛阳，或者把他枪杀了。双十二事变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蒋介石虽然推测张学良并无加害于自己的意思，但情况复杂而且自己树敌太多、结怨甚深，很难保证不发生意外。因此，蒋介石是作了此劫难逃的心理准备的。他对自己爱妻的交代表露出心情沉重。12 月 15 日，他给宋美龄留下了一份遗嘱。他写道：“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远在南京的宋美龄当然知道夫君生死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西安的局面无法控制，即使是南京也“戏中有戏”，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正想利用蒋介石的这一劫难，实现取而代之的美梦。蒋介石没有料到自己的后院会起

火，当他在被软禁的屋子里听到天空上隆隆飞过的飞机，还误以为他的南京下属们正在设法营救呢。直到读了宋美龄提到南京“戏中有戏”的那封信,才如梦初醒:原来何应钦派飞机轰炸西安，调军队讨伐张、杨，演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把戏，目的是把自己往死里推。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一条老命被许多人、许多方面牵系着,不免又增添了许多伤感。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飞机在西安上空侦察示威

扣留蒋介石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并没有妥帖的善后计策，他们随即向附近红色区域的中共领袖们求助。在解决头绪复杂的局势上,延安的中共首领们帮了张、杨的大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在事变前就已与驻西安的东北军、西北军来往密切,但对于张、杨突然扣蒋,事先没有预闻,因而对如何处理事变缺乏思想准备。中共最初的反映是复杂的。十年的仇敌落网,欣喜之余,部分人情绪冲动是难免的。要求枪毙蒋介石的呼声甚为强烈,即使在中共最高决策层里，对于事变的认识和态度也不统一。但在冷静研究事变的性质以及复杂的局面后，中共领袖们理智地认识到，处理不慎必将引发全国范围的内战，影响抗战大计。因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得到统一。



应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委派
周恩来(右)、叶剑英(中)、秦邦宪(左)赴西安参加谈判

12月17日，周恩来等人乘坐张学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派来的专机从延安降临西安。周先是与策动西安事变的张、杨等人商谈，向他们分析这次事变的性质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表示共产党方面的态度。22 日南京方面派来的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代表到达西安后，周恩来直接加入了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等人的谈判。到 25 日蒋介石安全地离开西安，这样的谈判虽然举行了多轮，但总显得急促了些。从南京代表的心态来说，尽快使蒋介石脱离西安这块险恶丛生之地是他们的唯一愿望，宋美龄甚至提出让蒋回南京度圣诞节的要求；从张、杨角度来说，也生怕夜长梦多，拖久了会节外生枝；从中国共产党一方来说，只要蒋介石答应服从抗战大局需要的一些条件，就算达到了目标。西安事变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下，以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方式得到和平解决。

说不尽如人意是因为没有留下一份白纸黑字的协议。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按照党中央初步商定的意见，与张学良确定了与宋子文等人谈判的 5 项条件：1. 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2. 下令全国援绥抗日；3. 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4. 成立抗日联军；5. 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召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议。张学良将这些条件告诉蒋介石后，蒋表示同意，并于 17 日派蒋鼎文回南京送去他给何应钦的手令，命何在 19 日前停止军事行动。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电文指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 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 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 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 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这 5 项要求与上述周恩来提出的谈判条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电文明确指出，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只要国民党同意这些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首次向国民党透露：放蒋可以，但必须是有条件的。此后，中共中央一边观察事态的发展，一边继续讨论西安事变的处置办法。19 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各界发出召开和平会议提议的通电，提议：(一) 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 由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和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军派代表参加；(三) 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议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四) 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从这一提议可以看出，中共对于放蒋还有一个经过全国认同程序的考

虑。20 日，宋子文先以私人身份由端纳陪同到西安探路，通过与张学良的会谈，了解到中共对待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后，于第二天即返回南京汇报。22 日，南京派出的宋子文等人飞抵西安。于是，南京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国共产党的三方代表开始坐下来谈判。蒋介石授意宋美龄、宋子文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并嘱咐他们对商定的条件不作书面签字，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等他回到南京后分条逐步实行。

谈判进程较为顺利。23 日，三方代表谈了一天。上午就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6 项主张进行了讨论。这 6 项主张包括：1. 停战，撤兵至潼关外；2. 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 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 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表示赞成，宋子文也表示理解并答应转告蒋介石。下午，三方就组织过渡政府和放蒋时间等具体问题进一步磋商。分歧主要是什么条件下让蒋回南京。宋子文显得颇为急躁，坚持蒋应尽快回南京主政，主张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蒋，等回到南京后再下令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周恩来和张、杨则提出中央军先撤走、上海的“爱国七君子”先释放，蒋才能回南京。暂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当天，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会见了周恩来，周希望宋氏兄妹劝说蒋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也为其个人利益考虑，停止内战，服从抗日。宋子文希望周做做工作，早日释蒋。

12 月 24 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再次会谈。宋氏兄妹关切的仍是促成对方尽早放蒋，因此在有些条件上作了些允诺。如保证撤兵，由两宋负绝对责任；西安发表释放爱国领袖声明，蒋答应回南京后立即释放，由宋子文负责实施，蒋回南京后发表通电自责等等。对 23 日商谈的其他条件也作了认可。下午，周恩来单独会晤了宋子文，宋显得积极主动，表示愿意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当天晚上，周恩来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向蒋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和政策，申明外侮当前，抗日之外无以图存，团结之外无以救国，内战下去只能加速自己灭亡的道理。蒋表示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6 项主张，答应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到南京直接谈判，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他生存一天，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但不知是出于脸面的考虑还是因为对谈判协议没有诚意真正执行，蒋介石仍不愿留下世人可以认定的文字痕迹，他表示自己将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履行谈判商定的协议，不作书面签字。

张学良在决定蒋介石命运的大事上表现得大胆而果断。当他得到蒋介石对 6 项谈判协议口头承诺的答复后，不仅主张立刻放蒋，而且还决定亲自护送



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时，张学良、杨虎城与蒋合影

蒋介石回南京。其实，当时对于放蒋问题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西安方面表现更多的是对蒋不作任何书面签字就脱身存有疑虑和担心。周恩来在23日的谈判后即向延安的中共中央发电请示："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在延安方面没有回复之前，周并不赞同草率地放蒋成行，更不同意张学良陪送，主张蒋在离开西安之前，理应有一份政治文件留下。杨虎城对轻易放蒋顾虑重重，对于这场"兵谏"，他与张学良同样是责任人，深知一旦蒋介石反悔，自己决无好下场。因此，从扣留蒋介石以后，在谈到释放蒋介石问题时，态度总是很谨慎。东北军、西北军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对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证之前就让蒋回南京，想不通。西安事变发生后，曾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担任召集人，负责研究事变处理中的有关问题。23日，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放蒋问题，提出以下几条意见：第一，蒋离西安前，必须把中央军先撤出潼关；第二，蒋离西安前，必须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第三，谈判的条件必须由蒋亲自签名，公诸报端。这个设计委员会只是个咨询机构，但这些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但张学良担心事态的发展会横生意外，出现他不愿看到并难以控制的结局。25日下午4时，张学良没有与中共方面商量，也没有与杨虎城通气，自作主张地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请来杨虎城一起送行，杨没有思想准备，但对张学良的决定已不能再说什么了。蒋介石在登上飞机前，重申了自己答应的6项协议条件。这时的蒋已显得轻松豁达，他对张、杨说："今天以前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实行，否则就不配做你们的领袖"。作了一番交代后，蒋与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走进待航的机舱。不一会儿，飞机启动离开地面，蓝天上飞机吐出的一缕白烟终于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画上了句号。周恩来等知道消息后，急速坐车赶到机场，但能够见到的只是云层中淡淡的机影。西安机场的这一幕留下了永久的历史遗憾。后人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豪侠举动有各种各样的评说，但张学良自

作主张,给自己带来了终生失去自由的苦果。

蒋介石以几句口头承诺,换得了脱离惊险噩梦的幸运。尽管蒋没有把纸墨留给世人作考察西安事变细节的凭证,然而,西安的"君子协定"还是记录在案的。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第三天,毛泽东起草的一份中共中央声明中透露了蒋口头承诺的 6 项协议条件,声明指出:既然蒋介石"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下面紧接着列出了谈判涉及的 6 项条件,并严正地强调:"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是的,历史肯定不会满足于口头的诺言,实践才是它的真实表白。蒋介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他履践诺言的诚意,又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呢?历史将作出答案。

2. 国共秘谈——"蜜月"在不欢中开场

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介入为国共两党的正式接触开了个头。由此开始,疆场上血战了十年的对头步入了第二次携手的合作时期。这一合作时期,至 1946 年全国性的内战重新爆发,凑巧又跨越了十个年头,第二次携手的路程与十年内战的路程一样漫长。尽管这次携手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并最终赢得伟大胜利的功绩铸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但国共两党的磕磕碰碰乃至兵戎相见仍时有发生,双方携手的路走得踉踉跄跄。1937 年可以说是国共两党解冤结和的"蜜月期",但它实在是一个不欢的"蜜月"。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关系的谈判从幕后进展到台前,从一般原则的商谈进展到具体问题的讨论。虽然磨合过程中的龃龉表明,两党十年内战遗留的创伤很难一时愈合,甚至不能根本铲除,但这样的谈判毕竟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国共两党进行了三次谈判。

第一次谈判从 2 月 9 日到 3 月 15 日,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次谈判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将近两个月,虽然西安方面与南京的联系不断,但蒋介石在西安口头承诺的条件一项也没有兑现。而且,蒋介石为了瓦解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结成的联盟,在采取行政措施如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同时,调集了 37 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一度使形势恶化。周恩来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帮助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克服对南京的对抗情绪,中

共中央也屡次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嘱其与南京交涉。蒋介石托代表转告，请周恩来去南京谈判。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在西安时与周恩来已有协议，没有必要再去南京，细节问题可另行委派代表商谈落实。况且，南京政府派大兵威逼西安，又扣着张学良不放，不能保证周恩来到南京去“不为张学良第二”。所以指示周恩来“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周恩来致信蒋介石：“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提出请蒋手书一纸，保证撤兵释张，和平大局一定，即可应约到南京谈判。但蒋介石决意要拆散西安的抗日联盟，也不可能放张学良回西安。中共权衡再三，感到僵持下去不利于实现全国抗日大局，便与杨虎城、于学忠等人反复研究，忍痛作了妥协，接受蒋介石的方案，杨虎城率部离开西安，东北军也西撤，由中央军和平进驻。第一次谈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



周恩来（右）、叶剑英（左）与国民党联络员张冲（中）在西安就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进行谈判

2月9日，顾祝同到西安就任，他的职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委派他作为与中共谈判的代表，后来派来的代表还有张冲、贺衷寒。中共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双方都很重视这次谈判，两党的最高领导对各自的谈判代表分别作了交代。蒋介石以“编共而不容共”为宗旨，要求顾祝同坚持关键的一条，让共产党放弃自己的主义和信仰，共同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指示周恩来，只要国民党能够真正确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国策，可以作些让步，但必须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从2月9日至3月15日，谈判一波三折，忽晴忽阴。一开始的谈判显得十分顺利，12日双方就谈判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第二天，顾祝同将协议草案的内容电告蒋介石。16日，蒋介石回电指示顾祝同：不要对共产党的军队谈接济饷款的数额，只和他们谈准许留编多少数量的军队。蒋介石最先定下的尺寸

是,只准编 2 个师,一个师 4 个团,8 个团共 15000 人,其余的人由国民党中央收编和安置。显然,这是蒋介石试图通过改编将中共领导的红军消化掉。当时陕北的红军约 5 万余人,蒋介石规定的这个尺寸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中共中央在军队改编的问题上态度很鲜明,即可以改变军队名称,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服从抗日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但这决不能取消共产党军队的独立性。因此,中共绝对不会接受蒋的这个改编红军的方案。周恩来心中的底数是,将红军改编为 4 个师,每个师人数 15000 人,下辖 3 个旅 6 个团,这样,4 个师的总数约 6、7 万人,与蒋介石所定的数量出入很大。

2 月 26 日,张冲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恢复与周恩来的谈判。张冲向周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允许红军改编为 3 个师 9 个团。周恩来坚持要编成 6 个师 18 个团,人数至少 6、7 万人。张冲答复,最多只能编 4 个师,人数 4 万人。谈判在这个问题上卡壳。3 月 1 日,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再次会谈,仍没有结果。周恩来将情况汇报延安,张冲也向蒋介石请示。3 日,毛泽东复电: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也不利。意思是可以降下点筹码。蒋介石复电则坚持 3 个师 9 个团的原议,不允更改。4 日,周恩来与张冲商谈,张冲自作主张答应可以改编 4 个师 12 个团,由他再与顾祝同商量后电告南京。周恩来表示同意。但南京方面在接到顾、张电文后,仍不愿改变原议。在此情况下,张冲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按国防师的建制改编,3 个师 6 个旅 12 个团,设一个总指挥部。周恩来一算,每个国防师可达 12000 人,3 个师加总指挥部的 4000 人,已达到 4 万人,决定同意这个方案。8 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谈判基本取得一致,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条文,让蒋介石最后定夺。

但顾祝同和贺衷寒很快反悔,扣下条文不发,并大加修改。11 日,贺衷寒将修改的条文拿出来与周恩来讨论。修改后的条文规定改编后的红军只允许保留 28000 人,而且全文充满“收编”等措辞,一再强调共产党必须放弃共产主义,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和蒋委员长的一切命令和统一指挥,盛气凌人,简直把协议修改成一篇收编红军的诏书。周恩来气愤地予以拒绝。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并明确指出:“两星期来我方步步退让,彼方着着进迫,现应改换姿势”,“声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3 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周转告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故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文抄送顾祝同、张冲,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